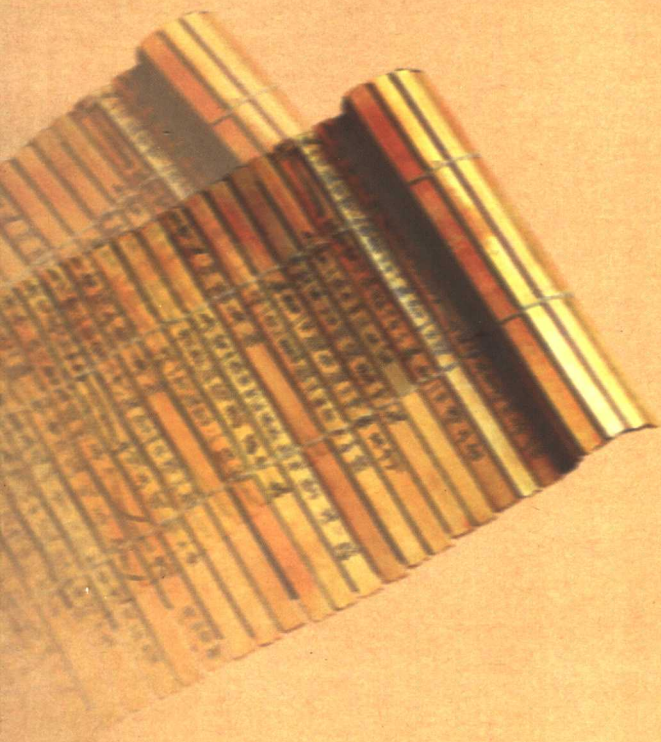


◎ 沈志华/主编

The New Book Review of  
Historiography

史学新书评  
(2000~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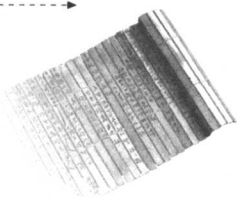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沈志华 / 主编

# 史学新书评

(2000 ~ 2003)

----->  
The New Book  
Review of  
Historiograph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新书评(2000~2003)/沈志华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

ISBN 978-7-80230-454-3

I. 史… II. 沈… III. 史学-书评-中国-2000~2003-选集 IV. G236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0586号

## 史学新书评(2000~2003)

---

主 编 / 沈志华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mailto: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鲁 颂

责任校对 / 段 青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1092毫米 1/16开

印 张 / 35

字 数 / 622千字

版 次 / 2007年2月第1版

印 次 /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7-80230-454-3/K·061

定 价 / 65.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史学新书评》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沈志华

编 委 于 沛      于采艺      白云涛      任贵祥  
刘 军      张 丽      张 彤      李 文  
李大龙      孙东升      陈 夕      武 力  
荣维木      徐秀丽\*      徐思彦      黄春生\*  
彭 卫

(有\*者为执行编委)

## 《史学新书评》团体成员

《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  
《史学理论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  
边疆史地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党的文  
献》、《近代中国与文物》、《中国历史文物》

# 目 录

-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 林甘泉 / 1
- 阎步克著《乐师与史官》读后 ..... 许兆昌 侯旭东 / 28
- 北宋开封环境资源的经营与利用
- 读《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 ..... 郭 媛 / 53
- 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
- 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 张 帆 / 60
- 明代蒙古史研究的上乘之作
- 《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评析 ..... 尚衍斌 / 72
- 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描述与分析
- 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 曹树基 / 79
- 关于近代粮食亩产量的估算问题
- 《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读后 ..... 高玉凌 / 93
- 重新审视“官僚资本”的几点想法
- 评《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 ..... 武 力 / 100
- 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
-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 ..... 史建云 / 109
- 放开视野，观察历史
- 就《太平天国史》的评价问题与吕实强先生商榷 ..... 茅家琦 / 127
- 是学术创新，还是歪曲历史？
- 评历史报告《温故戊戌年》 ..... 房德邻 / 157

历史研究应以求实存真为要务

——《庚款“退款”及其管理和利用》平议 …………… 石楠 / 166

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 何龄修 / 196

《清人别集总目》书后 …………… 辛德勇 / 215

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

——评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葛兆光 / 221

谣谚与新史学

——张守常《中国近世谣谚》读后 …………… 赵世瑜 / 237

近代史籍史料的整理应当务求准确

——以三种资料书为例 …………… 吴剑杰 / 246

拙劣的诡辩

——评黄文雄著《日中战争——“中国八年抗战”掩蔽的真相》

…………… 张振鷟 / 257

谁在制造“谎言”

——《日本南京学会年报》辨析 …………… 程兆奇 / 266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铁证

——读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1937~1938)》 …………… 张连红 / 296

评介佘义文先生的新著《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 …………… 步平 / 302

历史的公正：解读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

——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 …………… 李良明 / 316

历史功罪向谁论

——《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 …………… 陈铁健 / 323

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新成果

——评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 …………… 朱成甲 / 332

平实叙事 寓论于史

——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 …………… 汪朝光 / 342

## 历史转折年代的生动画卷

- 读金冲及新著《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鲁振祥 / 358
- 笔谈《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郭书田等 / 364
- “党内第一枝笔”、百科全书式学者的真实写照
- 《胡乔木书信集》评介……………李良志 / 381

## 建树与创新

- 读《龚育之论中共党史》……………鹿松 / 393

## 中国海疆历史研究的拓荒之作

- 《中国海疆通史》评述……………翁飞 / 402

## 一位现代女性史家眼里的古代妇女

- 《古希腊的妇女》一书评介……………郭小凌 / 412

## 超时代的真知灼见

- 吕西安·费弗尔的《莱茵河》一书的价值……………郭华榕 / 419

## 拓宽美国城市史研究的成功尝试

- 评《都市化时代》……………王旭 / 427

## 厚积薄发 历久弥新

- 评杨生茂著《探径集》……………杨玉圣 / 435

## 对现代性的否定与自我否定

- 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安然 / 443

## 探求中美关系的历史谜底

- 评陶文钊主编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任东来 / 455

## 伊朗危机与冷战起源研究的力作

- 读《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李铁匠 / 465

##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 评介艾尔松的《爱达荷华人往事》……………章开沅 / 472

## 一部“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

- 读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有感……………张耕华 / 483

相看两不厌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评介

..... 李伯重 / 500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读后 ..... 刘景华 / 514

自然破碎处 万物不复存

——汤因比论世界与中国命运 ..... 毛 峰 / 521

书评目录 ..... / 533



#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 早期历史行程<sup>\*</sup>

林甘泉

中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它的传承、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古代知识阶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古代知识阶层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但这个课题涉及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许多领域，有些问题见仁见智，还有大片空间留待我们深入探讨。

“知识阶层”一词来源于西方近代学界，它本指对社会现实持一种批判态度和人文关怀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知识阶层并不是近代独有的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知识阶层，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他指出“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名称是‘士’，但‘士’却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被称作知识阶层的。‘士’之变为知识阶层，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过程”。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流动，“导使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sup>①</sup>。这些意见都是很正确的。《士与中国文化》还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它堪称是研究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一部力作，因而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但我在拜读全书之后也发现，由于作者对儒家的道统情有独钟，使得他对若干重要问题的论述有失偏颇，甚至远离了历史实际。本文拟就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崛起及其早期行程做一些考察，并对余英时先生的有关论点提出商榷意见，以求正于余先生和各位方家。

## 一 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征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称呼由来已

---

\*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3、13页。

久，论者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士”的原始含义和指称作过种种解释。不管“士”的原意究竟何所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文献中的“士”主要是指下级贵族。《左传》桓公二年：“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足以说明士属于低层贵族。所谓“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禄田，与庶人受田耕作的性质不同。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仪礼》记载先秦名物制度甚详，其《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五篇，皆冠以“士”。姚际恒指出：“其实多通大夫以上而言，盖下而为民，上而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sup>①</sup>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士是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个低层贵族等级。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事物共生而混杂，“奇辞起，名实乱”，“贵贱不明，同异不别”<sup>②</sup>。阶级和等级关系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士的成分随之也就不再限于低层贵族了。<sup>③</sup>春秋时期，不少士已丧失了贵族身份而沦为平民，而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则脱颖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中来。《管子·问》：“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这些士或亲自耕田，或因贫困而借债，显然都已非享有禄田的贵族。《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载管仲建议恢复“昔圣王”之时让士农工商分区居住的制度，也说明到了齐桓公之时，士已经被视为和农工商并列的“四民”。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贵族出身的管仲，由于家庭贫困，曾和鲍叔牙一起做过生意，“分财利多自与”<sup>④</sup>。管仲没有受过系统的六艺教育，但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却因缘际会，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成为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子的先世虽是贵族，但他少时也“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sup>⑤</sup>；亦即在季孙氏手下当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墨子出身不详，学者或疑“墨”为刑徒之称<sup>⑥</sup>，从墨子的言行来看，说他出身微贱当不为过。孔墨这春秋时期的两大学派，其门徒很能说明士的成分之复杂。《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

① 姚际恒：《仪礼通论》卷一，陈祖武点校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② 《荀子·正名》。

③ 参看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

④ 《史记·管晏列传》。

⑤ 《史记·孔子世家》。

⑥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墨翟非姓墨为刑徒之称考》，商务印书馆，1936。

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狙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这些村夫、牙商、盗贼和骗子，都得以成为显学名士，在贵贱有别、等级森严的制度没有崩溃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时代阶级关系变动最重要的历史内容之一。

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公室和私门争相养士，士的流品就更加五花八门了。范文澜把战国时代的士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长于政论，凭口舌辩说猎取富贵。一类是方士或术士，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类是食客，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奸人罪犯、赌徒屠夫和市井无赖等。<sup>①</sup>范文澜上述分类中的某些人虽然并不属于知识阶层，但他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战国时代士的职业分途和社会属性，为我们理解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构成和整合提供了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切入点。

由于士的流品复杂，其称呼的覆盖面非常广泛，因而战国时代的士并不能和知识阶层画等号。那些没有掌握文化知识的武士、游侠和食客之类，显然是不能列入知识阶层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古代知识阶层原型的士，看成仅限于先秦诸子各学派的道术之士。不同时代的文化有其不同的历史内容。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和迅速发展的时代，新兴知识阶层在从其先辈那里继承历史积淀的文化知识的同时，不但会舍弃一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旧的文化知识，还会创造一些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文化知识。就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代的新兴知识阶层不但在知识结构方面比西周的贵族阶级合理，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且其队伍的规模也要比西周的士庞大得多。

《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士的射、御教育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诗》、《书》则成为与礼、乐并重的学习科目。事实上，到了春秋后期，礼乐在一些诸侯国已经崩坏，不论是新兴知识阶层或贵族阶级，有许多人已经不熟悉那些繁琐的礼仪和缺乏生命力的音乐舞蹈了。

<sup>①</sup>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9，第178页。

鲁国的孟僖子对礼仪不熟悉，感到遗憾，临终时吩咐他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去师事孔子。鲁国贵族如此，其他诸侯国贵族不懂礼的恐怕就更多了。但在礼乐崩坏的同时，器用之学却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这也就造就了一批器用之学的知识分子，亦即春秋战国时期所涌现的一批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器用之学的专门家，他们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天下》篇说：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庄子慨叹王官之学散在百家之后，“内圣外王之道”就“闾而不明，郁而不发”了。他所说的“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百家众技”，就包括上文所举各方面的专门家在内。他们虽然是“一曲之士”，不像先秦诸子那样对“道”感兴趣，而只从事器用之学，但也属“百家”的一部分，也应归入新兴的知识阶层。西方近代学者把知识分子限定在关心社会政治现实并持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这一群体。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和演变时，没有必要完全接受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标准，应该从我国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来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战国时代，正是由于新兴知识阶层成分的变化及其知识结构的改善，才突破了先前一统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出现了百家纷呈，“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局面，并产生了一大批人文道术和科学技术的著作。在《周礼》和《管子》等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设计，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考工记》是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总汇，甘德、石申的“星占”记录了观测天文的珍贵资料，《禹贡》开创了我国古代地学分区域和分部门研究的范例，《墨经》反映了我国古代光学、力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许多成就，《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总结了传统农业的重要生产经验。对于这些科学技术方面珍贵历史遗产的作者，我们显然是没有理由把他们排除在古代知识阶层之外的。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的篇首曾正确地指出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不适合于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可惜他并未能把这一观点贯彻到自己的论述当中。他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关于“哲学的突破”的观点，认为“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突破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文化事务专家”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

的最初形态。<sup>①</sup> 在余英时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就是中国“哲学的突破”，而以儒、墨两家为先导的诸子，正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藉，即所谓‘道’。”<sup>②</sup>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古代一些从事器用之学而并不把“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作为“精神凭藉”的专门家，也就被排斥在新兴知识阶层之外了。在另外地方余英时又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义。”<sup>③</sup> “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sup>④</sup> 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些人确实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但如果把“道”视为一种价值取向的话，那么应该说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而绝不能归结为“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汉书·艺文志》归纳先秦至西汉的诸子百家，其中如农家、天文家、阴阳五行家、数术家、刑法家、医家、方技家等，自有他们的“精神凭藉”，但这些人显然与“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是疏远的。而他们的成就和贡献，同样也是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事实上，即以余英时最推崇的儒家来说，许多人也未必都是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个多义性的概念。《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的“道”，是一种自然的法则或万物之宗。在儒家学说中，“道也者，治之经理也”<sup>⑤</sup>，亦即是一种治国的常规条贯。余英时认为孔子强调“士志于道”，而儒家之“道”即是仁义学说。孔子“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sup>⑥</sup>。对于孔子学说的真谛，学者可以有自己的诠释。但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道”，并不始于孔子

① 《士与中国文化》，第31页。

② 《士与中国文化》，第98页。

③ 《士与中国文化》，第97页。

④ 《士与中国文化》，第107页。

⑤ 《荀子·正名》。

⑥ 《士与中国文化》，第35页。

和儒家学派。《尚书·康王之诰》<sup>①</sup>说：“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之后人。”这里所说的“道”，即是对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的一种政治和道德的要求。《诗·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仲山甫可以说是恪守“道”的一个典型。《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同书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强调为政之道要“利民”、“为民”，这种理念和孔子及儒家后学的“民本”思想也是一脉相通的。尽管孔子和儒家学派对“道”的诠释赋予了更多的新的内容，但我们却不能抹煞它与先前“道”的观念的历史联系。

“道”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在西周曾经是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为自己树立的政治和道德的准绳。但如前所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关系的激烈变动和士的分化，“道”的观念已呈现了多元化演变的趋势。《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同篇又载：“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但是孔子对“道”的这种要求，其弟子门人未必都能做到。至于其他学派或没有学派的知识分子，各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念，他们或者是谈不到“志于道”，或者其心目中的“道”与儒家所理解的“道”并不一样。杨朱“为我”，他的“道”与余英时“对道”所诠释的“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恰恰相反。墨子“兼爱”，倒是可以说发展了“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但这种泛爱的关怀却又受到儒家的非议。孟子就把墨子和杨朱一锅煮，斥责他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sup>②</sup>。儒家鼓吹仁义，法家则公然宣称明主“不道仁义”<sup>③</sup>。先秦诸子的价值观念是如此地扞格不入，乃至互相攻击，怎么能把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说成是新兴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并且说正是孔子对新兴知识阶层性格特征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呢？<sup>④</sup>“士志于道”是孔子理想主义的精

① 汉初今文经无《康王之诰》。清代学者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述》引或说：“史迁据古文家分《顾命》‘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龚自珍、皮锡瑞并同此说。刘起钎《尚书学史》据《经典释文》认为是马融而非司马迁所分。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韩非子·显学》。

④ 《士与中国文化》，第35页。

神，把这种理念看作是现实生活中新兴知识阶层共同的性格特征，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一种虚幻的颠倒，并不符合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际。

余英时强调士的价值取向“以‘道’为最后的依据”，“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sup>①</sup>。其实，驱使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去求学、求职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动力，决不是什么“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而主要是现实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和对经济利益与权势的追求。《吕氏春秋·博志》载：

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

《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家贫，为兄弟嫂妹妻妾耻笑，“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徧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他取六国相印、荣归故里后，昆弟亲友惶恐恭迎，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宁越与苏秦求学求仕的事例，在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的知识阶层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墨子·尚贤》说：“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正如钱穆所说，儒墨两派的门徒都“相望以仕进者”，“覬仕为心理之同，游仕为世风之变，虽大师无如何”<sup>②</sup>。孔子在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同时，接着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郑玄注：“言人虽念耕而不学故饥饿，学则得禄，虽不耕而不馁。此劝人学。”<sup>③</sup>这是对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食”的深刻的诠释。孔子并没有用空洞的“宗教精神”来宣扬“道”，而是直率地指出，只会耕田而不学的人不免于饥饿；如果学而谋道则“禄在其中”，可以做官享受俸禄，虽不耕田而得免于

① 《士与中国文化》，第35页。

②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墨子弟子通考》。

③ 《论语·卫灵公》郑玄注。

饥饿。这完全符合当时士的价值取向。荀子同样也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sup>①</sup>

我们不赞成把“士志于道”说成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但并不否认古代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确实非常虔诚地固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信念。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sup>②</sup> 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sup>③</sup> 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人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都是非常“志于道”的，但他们并不把“志于道”和“仰禄”对立起来。孔子自己“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sup>④</sup>。孟子认为，“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sup>⑤</sup>。当然，士的流品很复杂，所以价值取向也很不一样。有的“仰禄之士”只热衷于追求富贵，与“志于道”的“正身之士”不可同日而语，例如一些以口舌猎取富贵的游说之士就是如此。但恰恰是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士志于道”不能用来概括新兴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因为这些并非“志于道”的游说之士，同样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组成部分。余英时引用荀子把士分为“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承认士阶层有分化，又说：“由于所处的时势不同，荀子笔下之‘士’其流品已甚杂，不可与孔子所言‘士志于道’之‘士’等量齐观，只有荀子所说的‘君子’或‘士君子’才与孔、孟所称道的‘士’约略相当。”<sup>⑥</sup> 其实，自从春秋时代士不再完全成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新兴的知识阶层出现，其流品便已日趋复杂，并不待到荀子生活的战国后期。

当士还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时，所谓“士食田”，说明他们是有恒产而不必仰禄的。西周的士之所以不能称为知识阶层，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知识，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精神凭藉和道德标准，而是因为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垄断了文化知识，排除社会下层广大的平民和奴隶享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西周士的这种封闭性，使得一个超越贵族阶级之外的知识阶层无从产生。

① 《荀子·儒效》。

② 《论语·泰伯》。

③ 《孟子·尽心上》。

④ 《孟子·滕文公下》。

⑤ 《孟子·滕文公下》。

⑥ 《士与中国文化》，第42页。



只有在贵族阶级已经分化瓦解之后，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sup>①</sup>，才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已不再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它的成员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平民乃至奴隶。这个在社会转型时期来自不同阶级的士阶层，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新兴知识阶层的原型。新型的士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他们虽有文化知识但没有“恒产”，虽有精神追求但价值取向并不一致。他们或靠文化知识作为仕宦的敲门砖，或者靠一技之长独立谋生。总之，不受身份贵贱限制，依靠知识谋生或仕宦，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才是新兴知识阶层基本的性格特征。

## 二 “道尊于势”是儒家精英的自恋情结

关于战国时代新兴知识阶层与当世王侯的关系，余英时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君主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师、友、臣三种关系，代表道统的士，“相信‘道’比‘势’更尊”<sup>②</sup>。君主虽然拥有权势，“但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到前三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内，知识界的领导人物却受到战国王侯的特殊礼遇。他们既不用向王侯臣服，也毋需为生活担忧。不但如此，他们的议政自由还受到制度化的保障。事实上，他们的主要职责便是‘议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士的功能实已发挥到最大可能的限度”<sup>③</sup>。对于古代知识阶层政治地位的这种分析和得出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余英时在书中引用《荀子·尧问》借周公之口所说：“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应该承认，春秋战国时代确实存在一些不慕富贵、不图安逸、坚持自身信念的“正身之士”；而有的王侯对于这种“正身之士”确实也是不敢“骄”、或者说是无法“骄”的。例如齐国的陈仲子号称“廉士”，靠“身织履，妻辟纻（绩麻）”为生，不结交王侯。但像陈仲子这样孤芳自赏的清高之士，在新兴知识阶层中是寥若晨星而没有代表性的。孟子虽然推崇陈仲子为“巨擘”，却如实地指出“仲子恶能廉”？因为他的生活实际上还有赖于家人的供给而不可能完全靠自

① 《庄子·天下篇》。

② 《士与中国文化》，第107页。

③ 《士与中国文化》，第61页。